



新疆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大时代里的 小杂志

——《读书》杂志研究



庞海音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作者简介



庞海音（1971—），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武汉大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期刊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1项，校内课题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夫 / 时 / 代 / 里 / 的 / 小 / 杂 / 志



出版人 葛海彦
责任编辑 曲建文
封面设计 田 晗



读书

本书将三联书店创办的思想文化评论类刊物《读书》作为研究个案，以文化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读书》杂志30年来的文本进行分析，探究《读书》杂志办刊理念的特点以及办刊思想转变背后的深刻文化语境，考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与历史使命的转变，关照当代文化的发展事实和发展趋势。阅读此书有助于读者全面、生动地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生成机制。

这是一部水准较高的学术著作，框架体系清晰，严谨，篇章设置结构合理，作者思路清楚，搜集的有关资料较为充实，论述充分而全面。关于《读书》杂志，以往很少见到这样成体系的深层的扎实的研究，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有很多前人所未涉及的。作为专门研究是人所未发的，有些研究角度的切入也很新鲜。

——三联书店前总编 李昕

此专著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前沿性。通过对《读书》杂志这份思想学术文化杂志文本的分析，考察了其创办发展、创新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变迁轨迹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梳理，并对这些重要影响进行了评价。

——中国出版集团前总裁 聂振宁



本社微信公众号
(请用微信“扫一扫”)



本社淘宝旗舰店
(请用QQ“扫一扫”)

ISBN 978-7-5117-3104-3



9 787511 731043 >

定价：3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时代里的小杂志: 《读书》杂志研究/庞海音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117 - 3104 - 3

I. ①大… II. ①庞… III. ①期刊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①G239. 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2932 号

大时代里的小杂志: 《读书》杂志研究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程 彤 曲建文

责任印刷: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元普瑞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 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55626985

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创办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当代思想文化类杂志的领头羊，它始终坚持“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宗旨，致力于“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映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思想文化律动，折射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也见证了时代和思想的发展轨迹。

《读书》创刊时的定位，就是既注重思想探讨，也注重文体风格。它尽力展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满足其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并以宽容理性的文化品格、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独特自由的审美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建构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论坛和宝贵的知识分子言论空间。《读书》经历了职业出版人办刊和学者办刊两个阶段，前者注重思想性和可读性；后者觉得问题大于形式，于是带来了社会各界对《读书》的非议。在这个中西交会、古今转变、中国人对西学所知甚少而对中学又几乎忘掉了的时代，《读书》杂志以某种不期然的方式充当了连接中西、古今之间交流的文化浮桥。

本书运用文本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文化传播为切入点，对《读书》杂志在改革开放30年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转变，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做了细致的梳理，立足于期刊史、思想史等角度，对《读书》杂志30年的文本进行考察，探究《读书》的办刊理念的特点以及办刊思想转变背后的深刻文化语境，观照当代文化的发展事实和发展趋势。

本书共分为九部分。导论主要论述了本书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

第一章 梳理了《读书》杂志诞生的政治和文化语境，《读书》与三联书店之间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承继关系，以及如何注重营造知识分子的归属感。

第二章 考察《读书》杂志的办刊宗旨和编辑策略。

第三章 探寻《读书》杂志话语特征的演变轨迹。

第四章 在新时期中国文化视野中，探究《读书》杂志如何通过理性精

神和批判意识的弘扬，来彰显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文化立场、价值判断。

第五章 《读书》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引介西方学术和新思潮，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影响了一代知识人。

第六章 《读书》一直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对现实问题充满了一种人文关怀，在理性思索中，强化了深邃的文化感与历史感。

第七章 较为深入、细致地探究《读书》杂志的文体特征、审美风格。

第八章 探究《读书》杂志对社会、知识分子以及出版业的影响，总结可资借鉴的期刊出版的经验。

将《读书》放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加以讨论不仅是一桩对近 30 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塑形行为，同时也为描摹当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这剧变的 30 年中，《读书》博采中外，掇拾古今，提供知识，不仅成为一个超越学术圈的公共空间，更体现了在 80~90 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历史使命的转变。它在思想层面所起的现实作用，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本杂志。

关键词：《读书》；话语；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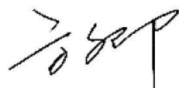
序

庞海音博士，曾师从我国文艺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和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程正民先生，现任教于新疆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良好的教育背景与扎实的理论功底为其从事编辑出版学教育及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0年3月，她来到武汉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访学，后进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基地，在我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先生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站期间，她严格要求自己，且能够认真听取合作导师和指导小组专家得意见，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努力进行课题研究，表现出良好的学识修养和创新能力。2012年12月，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融贯中西 通释古今——〈读书〉杂志研究》评审会在京召开。经与会专家严格评审，出站报告获得专家们的广泛好评。评审专家委员会认为，该报告主要运用实证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读书》杂志这份思想学术文化杂志着重进行了文本分析，考察了其创办、发展、创新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变迁轨迹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梳理，并对这些重要影响进行了评价，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出站之后，她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报告进行了精心修改，完成了这部专著。

创刊于“文革”结束后的《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目前，正当而立之年。30多年来，或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或是由于文化理念的认知，其办刊过程虽经历风风雨雨，但其社会文化影响却有目共睹，不可小觑。肯定也好、否定也罢，赞扬也好、诋毁也罢，广泛的非共识正是其影响的最好表现。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一种出版现象，《读书》杂志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遗憾的是，出版人对于《读书》杂志的关注往往流于肤浅，成体系的深层的扎实的研究并不多见。庞海音博士的这本著作所涉及的内容，有很多前人所未涉及的；有些研究视角的切入也很新鲜；一些观点和结论更是人所未发的，且不乏独到见解。仅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就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好作品。

作者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开展研究的同时，如果能够结合“当事人”的人物访谈，适当关照杂志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因素，尤其是历任主编的回忆与感悟，著作将更为丰满、更具说服力。这就算是我对作者后续研究的期待吧。



2016年6月30日于珞珈山

方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 录

导 论 一份引领时代的刊物	1
第一章 破土而出《读书》杂志诞生	16
一 《读书》诞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16
二 创刊过程	18
三 继承与渊源	20
第二章 兼容并蓄:编辑出版策略	24
第一节 办刊宗旨:开垦公共知识精神的家园	24
第二节 读者定位:思想者间的精神对话与交流	26
第三节 编辑者的风格与策略	29
第四节 作者群的凝聚与演变	35
第五节 期刊发行变动	41
第三章 踪迹《读书》话语特征的演变	47
一 思想解放话语——“读书无禁区”	47
二 新启蒙话语——“文化热”	52
三 向理论和学术话语倾斜——“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58
四 新世纪:多元话语间重建平衡	63
第四章 接源“旧学”,采纳“新知”——对中国文化的建设	70
一 对中国学术思想的讨论	70
二 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命运的反省	75
三 对民间文化的开掘	84
四 对历史和人物的书写	88
第五章 “看动静的窗口”——引介西方文化思潮	97
一 对西方文学的引介	98
二 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引介	104
三 关于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讨论	108
四 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引入	113

五	对民主等问题的探讨	116
第六章	“冷眼观热门”——《读书》的现实关怀	121
一	对中国改革推进的关注	121
二	对当代文学艺术及媒体文化的研究	130
三	对世界关系与民族认同的思考	139
四	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讨论	144
第七章	“不伦不类”——《读书》的美学追求	149
一	题材特点:言在书内,意在书外	149
二	文笔艺术:追求学术,出以文章	155
三	视觉追求:版式与插图	160
四	雅趣与杂趣:小栏目与美文	164
第八章	《读书》的影响	168
一	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168
二	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175
三	《读书》对书业的影响	187
结 语	《读书》的文化精神和传承	201
参考文献	204
后 记	213
作者简介	215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读书》杂志由中国出版集团主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自1979年4月创刊以来，以“读书无禁区”为口号，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传媒经典和广大读书人的一面文化旗帜。30年来，《读书》坚持“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定位，始终贯彻“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的宗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读书》已然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或读书界的一个标签和样本，或者一个缩影。《读书》30年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走过的30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历程。《读书》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与知识分子的思考轨迹，展示了思想文化类杂志在时代发展中的功能。

新时期是历史的转折点，国家社会的变革在思想文化传播领域有着具体的表现，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见证者，《读书》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想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也映现出思想文化界忧戚喜乐的情感律动。在当代中国社会激烈的变化中，《读书》能够始终和现实保持对话，主动介入许多重大思想问题的讨论，敏感地回应世界的风云变幻，它提供了一个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讨论的空间，为思想文化界搭建平等交流的平台。它依托三联书店这个良好的文人办刊传统和创办资源，在经济上、思想上、文体上保持了知识分子刊物的独立性。

《读书》创刊伊始，就以“读书无禁区”开启了一个敢于突破禁忌表达知识分子真实想法的风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一群职业出版家和学者在从事

启蒙和介入社会批判的借助于先天优势，凭借着优质的作者群以及新锐的思想迅速占领了大片读者市场，从而掌握了大众媒介的话语权，拥有了广大的文化消费群，将《读书》搭建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交流话语的公共平台。

创刊30年，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从内容来说，《读书》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既是这个时代的承受者，又是一个重要的策划者，这源于《读书》本身的定位和它的编辑主体。首先，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都有其自身的思想倾向，势必会影响杂志的面貌。其次，读者并不代表社会大众，所以无论再成功的杂志都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就内容的形成和延续、变化而言，主编无疑是最大的主宰者和掌舵者。从创刊至今，《读书》先后经历了四代主编的更替：第一代（1979~1986年），陈原、范用；第二代（1986~1996年），沈昌文；第三代（1996~2007年），汪晖、黄平；第四代2007年至今，吴彬、潘振平、樊希安。每一时期各有其办刊风格和特点，但都围绕杂志的定位和宗旨进行编辑开拓。1996年之前的《读书》，延续早期注重专栏、老作者和文学的特点，大量介绍各国文学和外国文化。它以浓厚的人文精神，顺应了时代的求知潮流和“文化热”，竭力引进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帮助读者开阔视野，并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以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领域为主的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的特征。它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来涵义，一度成为启蒙运动的重镇。1996年之后，《读书》编辑方针发生了大改革，由专注知识分子人文趣味的杂志转向具有强烈现实性和针对性的杂志，并延续至今。“代际的转变，一方面象征汇聚在《读书》这一个思想书写阵地中知识分子的差异：从报人到学者、从关注文史哲学到融入社会科学视角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读书》本身在定位、选材上的变化，进一步反映该刊物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关系的不断调整。”^①

《读书》的“撰稿人大都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学者、专家与文化人”，它拥有当时作为社会精英的核心资源的知识分子，其栏目的设置与社会话题的推动，使《读书》杂志具有了历史性格的同时更张扬了个性。它的作者群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发生着改变，从怀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文化激情的启蒙者转变为冷静、客观、务实，既关注自身又关注社会问题的批判者。

《读书》面向普通读者，兼具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办刊方针以及其得天独厚

^① 叶国豪：《〈读书〉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书写纪录》，共识网，2014.6.4. <http://www.21com.net/articles/sxwh/>。

的“天时、地利、人和”，不仅吸引了知识界众多优秀知识分子的投稿与参与，更在30多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读者。它的“读者群，遍布各行各业，包括公司职员及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大学生、媒体从业人员、政府官员等。他们普遍具备高学历、高收入的特性”^①。

尽管《读书》的读者年龄和学历跨度较大，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在分流，但他们无疑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这些共同特性。

30年来，《读书》敢于接触敏感问题，充当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率先引进西方文化的精华，见证了当代知识分子思想成长的轨迹。《读书》的问题意识、话语模式、行文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当代知识分子活动的晴雨表。

纵观《读书》30年来所刊发的文章，我们会发现，《读书》力图从文化领域与现实问题领域呈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折射出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的反思与探索历程。在这一新的认知视角中，我们可经由期刊去探求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冲破思想禁锢是《读书》的第一个特征，那么高举思想启蒙的旗帜、传播西方文化则是《读书》的第二个特征。从初创开始，《读书》就在最大范围，以最快速度、全方位评介20世纪西方民主新思潮，比如冯亦代先生的“西书拾锦”专栏，赵一凡先生的“哈佛读书杂记系列”等等，都在当时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影响了一代知识人，而且后来还延续成三联书店的出书风格。除此之外，《读书》还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侧重对人、对国家及民族的人文关怀。从创刊号的《读书无禁区》，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新启蒙运动，再到90年代改革的推进与反思，2007年吴彬任主编至今，《读书》回归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主兼顾学理，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读书》区别于其他的刊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有人曾如此评价道：“《读书》是和改革时代的脉搏一起律动的，它呼应了这个时代提出的主题：启蒙。五四以来的那种启蒙精神长期湮没在历史中，‘文革’后才再次涌动而出。这种精神渗透在《读书》中，又通过《读书》延续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和笔下。于是，《读书》上承五四精神，下启改革思潮。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启蒙精神，让《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思想‘风暴眼’”。^② 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终于把

① 三联书店网站 http://www.sdxjpc.com/ad/ad-dushu_shtml#5。

② 马国川：《〈读书〉干了两件事：解冻和启蒙》，《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8日。

《读书》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

曾经有媒体这样评价《读书》：“一本 32 开的刊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阵地。25 年的沧桑变化，记载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延续和殖变。……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汲取了《读书》的营养，但是这本杂志在知识界的权威却不容置疑。90 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生中进行了中国‘当红学术明星’调查，其中九成都属于《读书》的读者。”^①《读书》对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究竟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我们难以具体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读书》一直密切关注文化的命运和现状，致力于记录时代思想文化特征、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在当今全球技术至上、物质主义甚至反智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在文化产业内部，作为文化产品的杂志其内在的文化与商业两重属性出现严重倚偏：低俗、大众娱乐文化大行其道；严肃、高雅、精英文化难以为继。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数字媒介逐渐取代印刷文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文化在生产 and 消费群体上的分野渐次清晰。在多元化价值观的视角下，《读书》以前积累的光环被逐渐“祛魅”，掉落“凡间”，从思想旗帜无奈回归到杂志本位，和其他书评类杂志和学术杂志竞争。

自汪晖、黄平担任主编开始，《读书》呈现出明显的学理化倾向，专业化学术化文章的比例逐渐增大，影响了其文风和特色，在可读性上饱受争议，发行量大大缩减。就外部而言，时代的变化导致读者需求的变化和选择的增多，大多数文化类杂志难以适应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生存和发展的冲击，没有积极主动而有效地寻求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的生存和发展之道。1993 年创办的《东方》杂志，以专家论说社会现象以及学者评点文化生活为定位，也是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这份文化评论杂志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并提倡知识界成为当代中国变革的一个重要媒介。它与《读书》有一定的重合度。虽然只开办了三年即停刊整顿。同时，《中国图书评论》《书屋》《书城》《天涯》《万象》等同类读书类期刊的迅猛发展，无形中分流了《读书》的部分读者和影响力。因而，面对这种境况，《读书》必须从自身和市场的考虑出发，探讨如何在保持文章的高品质和继承反思批判传统下得到新的发展，突破来自自身和外界的重重困境，找到符合我国出版业实际的发展路径，达到新旧出版形式的融合与共赢目标，实现出版业大发展与大繁荣。

① 罗雪挥：《〈读书〉25 年》，《新闻周刊》2004 年 8 月 23 日。

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 30 年来受到知识分子群体异乎寻常的关注，与刊物本身的特殊性有关，更与刊物生存的特殊语境有关。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发生了全面的变化，思想观念和文化也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从单一的纯粹的乌托邦形态向多元文化并存的转变；从以政治生活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向经济建设为主；昔日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认同也基本解体，突出的是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多元文化选择的尊重。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语境中考察《读书》杂志在当代文艺思潮中的角色意识，追问它是如何担当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角色。从中发现衡量多种社会力量、意识、传统与文化的作用与碰撞。

《读书》的选题视野、读者定位、办刊风格以及所引发的各种争论和热点问题，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30 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富于精神象征意义的标识、一个带有文化隐喻色彩的符号系统。要了解 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不能不对这本杂志给予极大的关注。

选择《读书》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它是当代人文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老牌杂志，在思想文化类杂志中以骄人的销量在知名度和影响力上都位居同类杂志之首，它代表的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代表的是近 30 年来中国文化精神的所在。它一方面焊接着中国传统文化业已中断的脉，一方面努力联系着与之相对称的西方文明，以两者的结合来对中国现实发生作用。^①而且《读书》有当代思想和文化的背景，其所经历和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单单是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当代思想界文化界在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持续的时间还是涉及时代主题的贴切性和问题的广泛性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代表性。

王思任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②一本好的杂志，代表的就是一个时代。联系《读书》诞生及发展的背景，可以说，作为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思想传媒，这本杂志曾一度赢得了一个时代。它的风格和品位已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备加珍爱的精神食粮，其影响堪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相提并论。特别在它创刊后的 30 年里，以其坚守的人文光芒，温暖了追求真知灼见的人们，照亮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其思想启蒙的理性诉求，驱

① 朱伟：《〈读书〉记》，《当代作家评论》1994 年第 2 期。

② 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唐诗纪事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

逐了浩劫乍息时的混乱、百废待兴间的阴霾和精神荒原上的黑暗。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媒介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整合态势，尤其是国外对于媒介文化的研究早已如火如荼，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从早期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理论”、麦克卢汉的媒介阐释学、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到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波德里亚的文化消费理论等，都是对当代文化传媒研究与批评的极有启发的理论，笔者也受这些理论的启发，但是无意于用这些理论或某一理论来框套中国经验，但他们理论研究的方法、角度和分析的思路，为本书的媒介研究提供了值得深入的路径。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概念是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对西方市民社会“理想模式”的一种具体性的表述。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范围，在此范围内能够形成像公共舆论这样的事物，从原则上讲，公共领域的大门向所有公民敞开……在处理共同关心的事物时，公民联合行动，不受制于强权，有了这种保障，他们便可以自由聚会、结社，自由发表和公开观点。^①“公共领域”要在民间社会发挥其影响力，必须借助于许多物质化的手段，而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方式之一就承担着这种重要使命。不同的创刊理念与舆论导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由发表于公共观点”，以“民权”对抗“强权”这些“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能否形成。

期刊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形式，它既是一个时期社会文化的载体、资料库，也以其自身的想象，塑造出新的文化品格。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和传播工具，期刊杂志不仅呈现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讨论，而且折射一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整体以及政治经济对其的影响渗入。期刊发表的作品就是期刊的言说方式乃至言说立场。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作者的看法就是期刊的态度，但是从期刊发表文章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期刊的认同和采取的立场和策略，所以对期刊发表的各种文本深入地展开研究，从细读中发现那些精微的事实，以此作为期刊研究的核心之一。

国内一些学者也纷纷拓宽研究领域，尝试从不同视角切入传播媒介和

^①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转引自魏斐德：《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载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4页。